

上 篇

第一章 1978——当代中国 主体意识的觉醒

1964年，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在一篇科学论文中，提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观点，认为基本粒子不是不可分的。这篇文章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认为，坂田昌一的这个观点，是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立场上说的。是年8月24日，毛泽东邀请物理学家周培源和哲学家于光远就这个题目进行了一次广泛的有关现代科学和哲学的谈话。

在这次谈话中，于光远多次向毛泽东请教，其中议论到认识论中的主体问题。

于光远问：“哲学书里通常只以个人作为认识的主体，但在实际生活中认识主体不只是一个一个的人，而且常常是一个集体，如我们的党就是一个认识的主体。这样看法行不行？”

毛泽东对此作了肯定的回答。他补充说：“阶级就是一个认识的主体。最初工人阶级是一个自在的阶级，那时它对资本主义没有认识。以后就从自在阶级发展到自为的阶级。这时它对资本主义就有了认识，这就是以阶级为主体的认识的发展。”^{〔1〕}

于光远的提问和毛泽东的回答无疑都是发人深思的。

近代西方史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诞生，标志着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转变。这一学说的产生，固然是马克思、恩格斯个人长期从事科学研究的成果，是他们智慧的结晶，而更为深刻的基础则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日益暴露以及工人阶级阶级意识的觉醒。马克思主义学说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得以产生，而它一经产生

又反过来促进工人阶级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转变，为他们提供了科学地认识资本主义的思想武器，使之对资本主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并组织起自己的政党，为消灭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而斗争。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工人阶级以阶级为主体对资本主义认识过程的简略勾画。

在这里，我们引用毛泽东与于光远的一席谈，目的不在于去回顾在资本主义兴起过程中，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是如何从自在到自为的转变。在我们研究的课题中，对这则对话所以感兴趣，是因为：第一，它鲜明地提出了认识论的群体主体论思想，它明确地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对客体对象的认识，特别是对社会历史现象的认识，其主体承担者应当是而且也只能是当时占主导地位阶级及其政党。第二，它还启发我们联想并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形态转化为现实时，出乎其创始人所料，它不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而是在生产力相对落后、资本主义相当不发达的国度里实现的。那么，对于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来说，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否也有一个从自在到自为的转变过程呢？

我们的思考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

1976年对于生活在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个难忘的悲喜交加的年份，在这一年里，发生了毁灭性的唐山大地震，24万生灵霎时丧生。还是在这一年里，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继周恩来、朱德之后，溘然辞世。虽然，人生自古谁无死，对于年逾八旬的老人来说，本是合乎规律的事情，按照中国的传统文化，该属于白喜事的范畴了。然而，此时此刻，八亿中国人民却因顿失舵手而茫然不知所以，是谁将继承毛泽东的遗志，把当时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事业进行到底？人们翘首以待，

焦虑万分。经过难熬的几十个日日夜夜，正义终于战胜了邪恶，“四人帮”被彻底粉碎了。否极泰来，这一年的十月，当枫叶红了的时候，大悲转化为大喜，神州大地，一片欢腾。

在毛泽东逝世不到一个月的光景，神速地把万恶的“四人帮”抓起来了，这的确是十分壮丽的历史篇章，值得史学家们大书特书。的确，如果没有这一着，今天的中国将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啊，说来使人不寒而栗。由于“四人帮”恶贯满盈，对捉拿“四人帮”的壮举，除极少数“文化大革命”的既得利益者外，绝大多数人是不难取得共识的。然而，粉碎“四人帮”之后，道路怎么走，又是另一回事了。这里，首先触及到的，是如何评价晚年毛泽东所缔造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由他亲自动机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大家的想法、看法，就迥然有别了。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他在人民中所享有的崇高威望，无可讳言，是扎根于深厚的实践基础之上的。中国人民从以往无数次的成功与失败的比较中，确信毛泽东是真理的化身，跟着毛泽东与追求真理，在一代人的心目中，几乎是同义语了。由于毛泽东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倡导者和实行者，人们对毛泽东的这种敬仰乃至崇拜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推动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和新中国前进发展的一种强大的精神动力。但是，从 50 年代后期开始，毛泽东的思想逐渐与客观实际相偏离，首先表现在他对国内外政治形势的错误估计以及对八大确定的正确路线的质疑和修改。这时，本该诉诸实践去纠正其主观错误，但由于业已形成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以及体制上的其它缺陷，使毛泽东对实事求是的偏离不但未能纠正于萌芽之初，而是愈陷愈深、愈演愈烈，以致酿成“文化大革命”悲剧的发生。从偏离八大路线开始，经过八届十中全会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至“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在毛泽东那里（经过“四人帮”的推波助澜）形成了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

理论。在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中，这种理论被奉为至高无上的绝对真理，以最高指示的形式，禁锢着人们的头脑。“四人帮”（还有林彪反党集团）是这个理论的鼓吹者，他们的垮台，本应引起人们对这个理论真理性的怀疑，然而，最高指示的权威实在太高了，“四人帮”的失败，也被认为是他们对最高指示的背离。

在粉碎“四人帮”之时，最高指示就是绝对真理，人们即使不是自觉地、也会惯性地沿着在“文化大革命”中业已形成的这种思维定势去观察一切，只要是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哪怕是片言只语，甚至是错误的论断，都被看作是衡量一切是非的准则。这就是“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个今人看来是如此明显地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真理观的命题，在 1977 年 2 月 7 日却能够毫不掩饰地出现在当时具有最高权威性的“两报一刊”^{〔2〕}的社论中，并且成为当时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处理一切重大政治事件的准则。

对“两个凡是”的否定，不仅需要高超的睿智，还要有敢冒政治风险的气魄！

经历过这一段历史的人，不妨把镜头转回到二十年前，想一想当时的情景。就本人来说，第一次接触到“两个凡是”，是在农村参加基本路线教育运动期间，在一次由我主持的大队两级干部会议上，我宣读了“两报一刊”那篇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当读到“两个凡是”的字句时，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用今天的眼光看，应该感到羞愧万分，无地自容，为什么中央党校培养出来的哲学专业毕业生，连这么一个违反马克思主义理论常识的问题，都毫无察觉呢？不过，历史地看，这又是不足为奇的。后来我到中央党校任教时了解到，就是在邓小平提出对“两个凡是”的批评之后，一些高层的理论界权威人士和身居高位的“政治家”，还起而攻之，斥之为“砍旗”呢！

这里插上一段历史回忆，是有感于对“两个凡是”的批评，确实是伟大的历史举动。读《邓小平文选》第2卷，我们看到，在“两个凡是”见报之后第三个月，邓小平就斩钉截铁地说：“‘两个凡是’不行。”“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他高屋建瓴地指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把作为科学思想体系的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个人晚年的错误严格地加以区分。毛泽东思想表征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革命事业领导主体集体智慧的结晶，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真理，而毛泽东个人的思想则不然，有真理，也有谬误，尤其是在他的晚年，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偏离了他自己一再倡导的实事求是以及在这条思想路线基础上确立起来的毛泽东思想，发动了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文化大革命”，断言这种“革命”今后还要搞好多次。他虽然也觉察到问题不少，但是直至他临终前仍坚持这场“革命”是成功的。错误与成绩不过是三七开而已。甚至把它与建立新中国的伟大业绩相提并论，看成是自己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

如今，“文化大革命”已经离我们远去了，今天的年青人也许无法理解何以会有如此天方夜谭的事情发生，然而，对于亲身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们来说，它的确是令人终生难忘的客观实在。和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一样，“文化大革命”也是具有两重性的，它是灾难，又是财富。它使人压抑，又促人思索。为什么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竟会出现如此伤天害理的事情呢？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中国共产党内确实汇集了中华民族的精英，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们之中头脑清醒，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不惜代价对这场反理性的动乱进行抵制和批判者不乏其人。众所周知，在久经考验的老党员中，有著名的被称作“二月逆流”的壮举，在年轻党员中，有名垂青史的张志新，以及许许多多不知名的英烈和幸存者。然而，中国共产党又是生长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封建主

义传统很深的国度里，它不可能不受到传统思想文化的消极影响。在“文化大革命”的特定环境中，我们看到封建糟粕沉渣泛起，霎时间，几亿人疯狂地卷入了彻头彻尾封建式的“效忠”运动之中。人民领袖无异于神灵，被供奉起来，接受世俗子民的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遍及老幼，“红海洋”铺天盖地，千奇百怪，不一而足。

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逝世了，此时，“两个凡是”的提出，是完全符合传统、符合人们的思想惯性的，它是一种对毛泽东忠诚的标志，而对“两个凡是”的否定，反而有叛逆之嫌了。

然而，中国共产党毕竟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主流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它不能容忍封建糟粕长期对党的肌体的侵蚀，毛泽东的去世，为结束这段畸形的历史带来了契机，中国共产党需要自己新的代表人物，去扭转乾坤。邓小平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再度登上历史舞台的。

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层中少有的三落三起的传奇式人物。第一个回合是1931年在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担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的时候，由于他反对临时中央的“城市中心论”，反对用削弱地方武装的办法来扩大主力红军，反对“左”的土地分配政策，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被撤消了省委宣传部长职务，在1934年12月长征途中，才再度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第二个回合，众所周知是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中，这场革命刚刚鸣炮，他就被认定是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被打倒。林彪的反革命政变阴谋失败之后，1973年，毛泽东命邓小平重返政坛，担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1975年，毛泽东认为他犯了右倾翻案错误，邓小平再度受到批判，1976年，邓小平又被认定为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后台，经毛泽东决定再一次被打倒。毛泽东去世，粉碎“四人帮”之后，1977年2月邓小平才又恢复工作。邓小平本人对他这三落三起的经历从不回避，他三次降职去职，并非因为有什么过失，恰恰是他处于正确的一方，坚持实事求是所

致。这种特殊的经历，特别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处境，使邓小平对中国的事情，特别是对共产党内部的事情有着比一般人更为透彻的了解，更为深邃的思索。是邓小平第一个提出对“两个凡是”的批评，这决不是偶然的，它充分体现了在毛泽东之后，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这个领导主体中的核心作用。

“两个凡是”的反马克思主义实质，今天看来，是如此明了，而在 70 年代，这不仅是一个被搞糊涂了的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极为敏感的政治问题，它关系到是否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从《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中，我们看到，邓小平是极为谨慎地提出对“两个凡是”批评的，他首先强调毛泽东思想是一个思想体系，要完整准确地理解。从 1977 年 5 月提出对“两个凡是”的批评，经过 1978 年对实践标准讨论的支持，到同年 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从思想路线的高度加以总结，从此结束了被一种错误理论搞乱了的年代。在重新确立起来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以邓小平为领导核心的一个崭新的年代开始了。

二、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再认识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提出一个口号：宁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他们把邓小平主张发展生产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思想斥之为“唯生产力论”而加以批判。由于当时他们打着宣传最高指示的旗号，加之完全控制了全部宣传舆论阵地，这种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就相当深入人心了，直到结束“文化大革命”之后的若干年，甚至在后来学习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时，还常常听到一些人的质疑：这和“唯生产力论”又有什么区别呢？

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邓小平无疑比一般人都思考得更早，思考得更多，思考得更深。他认为这是解放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1980年，在向外国友人介绍中国的情况时，他说：“不解放思想不

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99〔3〕}“不能因为有社会主义的名字就光荣，就好。”^{100〔4〕}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99〔5〕}这一年，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在西藏地区考察时，就提到对社会主义要进行再认识。这本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命题，对任何事物的认识都有一个随实践的发展不断深化的过程，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是合乎认识规律的，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对它的认识，自然也不例外。更何况，我们以往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确实陷入了误区，为什么不可以对它进行再认识呢？然而，对“再认识”这个提法有人认为对社会主义是不合适的，以至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时，竟把它当作一个错误观点而加以批判。

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固然被“四人帮”扭曲了，但是并不至此为止，清除了“四人帮”的影响，人们头脑中的束缚也仍然未能得到彻底的解除。事实上，对社会主义认识的蒙昧状态，有更为深刻的原因，有必要从社会历史根源以及我们党自身这个主体上去作更深入的考察。而党的整个认识水平，又是受制于其领袖的认识水平的，尤其是在领袖的权威已经达到至高无上的情况下。

邓小平立足于中国社会的实际，特别是我们党的实际，经过深思熟虑，在对建国以来重大历史问题作出决议并对毛泽东的历史功过作出了正确评价的基础上，于 1984 年第一次向世人承认：“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6〕}在不同场合类似的说法，几乎不下一二十次。对于一个以建设社会主义为己任的政党来说，承认自己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这需要有多么大的理论勇气啊！只有站在彻底的唯物主义立场，对历史负责的郑重的党才能做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够清醒的情况呢？邓小平进一步指出主要是由

于对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认识上有偏差，这种认识上的偏差又首先表现在我们党的领导核心中。

恩格斯说过：无论哪一种学习都不如从自身的错误中学习来得快。在整个 80 年代，特别是在十二大至十三大这段时间里，邓小平始终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对建国以来特别是 50 年代末期以来我们党的认识和实践进行了深刻的反思。邓小平认为，从 50 年代末开始，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开始偏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由此带来了一系列的失误。

对这段历史的反思通常是由 1956 年开始的。1956 年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年份，这一年召开了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大会根据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一事实，认为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决议中说“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在大会之后，从 1956 年的下半年到 1957 年上半年，党的几位主要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同志都一直向党员和人民宣传和解释这个思想。

从现在来看，八大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的分析也许还属浅层次的，但却是符合实际的，所以毛泽东尽管对它的文字表述尚存异议，仍表示认可。但是，从全党来说，这种认识还缺乏牢固的根基，以至在一些始料未及的事件出现时，就发生动摇了。

最突出的事件，从国际上看是苏共二十大的召开以及在它之后引发的波匈事件，从国内看则是由党的整风所引起的所谓“右派”的进攻。这两件事情，回过头来看，是可以从多角度去分析的，可以从中引出一些有利于认识社会主义和实践社会主义的积极结论。但是当时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还处在相当蒙昧的状态，对于突发事件只能惯性地沿袭民主革命时期处理阶级矛盾的

思路和方法。

就这样，八大之后的第二年，在 1957 年 10 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便轻率地否定了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结论，重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这个错误的论断在以后的实践中，不但没有得到纠正，反而愈陷愈深，到“文化大革命”，系统地概括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新贡献。

在这样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我们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是和阶级斗争紧密相连的，它充分体现在 1962 年八届中全会上提出、后来被认定为基本路线的一段文字概括中。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不妨把这段文字抄录如下，作为前车之鉴：

“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无疑这一段文字是经过整理的，但从史料中可以确证，其基本思想是属于毛泽东的。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它是毛泽东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回答，或者说是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这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观，把发展生产力排除在外，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极大误解。在它的导引下，从 50 年代末至 70 年代末的二十年间，世界经济迅猛发展而我国的生产力却几乎停滞不前，至 1978 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还不到 250 元，有将近 2 亿人还未解决温饱，真是相形见绌。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经过拨乱反正，它

理所当然地被否定了。邓小平说：“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领袖，中国革命是在他的领导下取得成功的。然而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7]又说：“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8]

导致我国二十年生产力发展缓慢，无疑主要来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思想干扰。与此同时，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实践上的空想成分，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学说，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已经有了几百年的历史，这是建立在唯心史观基础上的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的功绩是立足于唯物史观，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不同，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以资本主义社会所提供的高度发展的生产力为基础的。

历史发展出现了马克思、恩格斯所没有预料到的特殊情况，社会主义革命不是首先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国家中发生，相反，是在生产力相对不发达的国度中实现的。列宁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这种先天不足是有所认识并给予重视的。他认为生产力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要比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国家困难得多。毛泽东对此却不以为然，他没有从中警醒，反而批评了列宁的看法。他认为，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比先进国家更加容易，原因是人民头脑中的资本主义思想比较少，不像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那样，中毒很深，难于改变。毛泽东把我国生产力落后的状况，称之为“一穷二白”，并极力颂扬它的积极作用：“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9]这种史诗般的语言，在一定条件下的确对人民起着激励作用，但是，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就很难说不带有“乌托邦”的成分了。

在毛泽东领导建设社会主义的年代里，对生产力的发展是漠

视的，而对生产关系的变革却十分关注。从 50 年代后期开始，毛泽东不遗余力地追逐生产关系上的“一大二公”，至于这种大和公是否给生产力的发展带来好处，是否给人民的生活带来富裕，却没有进入毛泽东的视野。他的兴奋点始终是在一大二公上面。1959 年，毛泽东提倡并带头学习政治经济学。在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有这样一段话：“由于有了集体农庄，农村中无马匹、无好牛、无农具的农户没有了。”毛泽东在这里加了批注：“这点很值得注意。就他们来说，一方面表示他们农民富，另一方面表现他们那里个人副业经济还相当强。就我们来说，比较起来，一方面我们的农民还很穷，另一方面，我国农村的公有化程度却比他们那里高。”逻辑就是这样：穷不要紧，公就行了。一大二公动摇不得，哪怕人民一贫如洗，这种信念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农村实行体制改革之前，还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这种一大二公的观念是完全摒弃生产力基础的。毛泽东想跳出苏联的模式，举起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创造性地走出一条具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来。但是，由于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不完全清醒，甚至带有浓重的空想色彩，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探索是不成功的。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业绩中给中国人民带来幸福的毛泽东，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事与愿违，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大灾难，这不能不说是一悲剧。

三、从自在状态向自为状态的飞跃

毛泽东是实践家，又是伟大的哲学家。当“三面红旗”在实践中受挫之后，1962 年 1 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曾领导全党进行过认真的总结，他的讲话专门有一部分从哲学的高度阐述了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寓意非常深刻。毛泽东认为，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对民主

革命，认识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对于建设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也必须有一个过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我们还没有经验；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估计要花一百多年；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然后，毛泽东系统地做了哲学的概括：“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先是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经过反复的实践，在实践里面得到成绩，有了胜利，又翻过斤斗，碰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然后才有可能逐步地发展成为完全的或者比较完全的认识。……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10〕}在这篇讲话中，毛泽东承认我们最近几年干过许多蠢事，也承认他本人注意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他说：“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11〕}

毛泽东的理论总结是深刻的，但是，他对 1958 年以来的错误估计不足，他肯定了刘少奇报告里说的“最近四年，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刘少奇的报告，按当时的情况，当然体现了毛泽东的思想）致使在以后的岁月中，仍然沿着被认为是正确的错误路线走下去而不能自拔，终于酿成了他晚年的悲剧。

在生产力非常落后的大国里建设社会主义殊非易事，即使有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久经考验的成熟的领导主体，有毛泽东这样一位智慧过人的领导核心，也难免要付出高昂的代价，难怪在若干年之后，邓小平作为经验之谈曾劝说非洲一些友好国家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12〕}

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但是，建设一个优越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尤其是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将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它不可能靠一代人，而是要靠几代人，不可能靠个体主体，而只能靠群体主体去完成，毛泽东虽然伟大，但也不可能不受到历史的以及自身主体条件的局限，社会主义的自由王国对于他自然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了。

但是，毛泽东的探索，且不说其中确实也有不少闪光的东西，就是不成功的以至失败的方面也仍然是宝贵的思想财富而注入后人的继续探索之中。

在毛泽东之后，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核心，继承了毛泽东的未竟事业，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新的历史起点，率领中国人民进行了新的探索。作为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始终全神贯注地抓住了毛泽东晚年没有解决好的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主题，依靠群众，依靠实践，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经过十二大，到十三大召开的时候，全党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飞跃，在集中全党智慧的大会政治报告中，第一次向世人展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

邓小平对十三大取得的成就，极为满意和珍惜。在大会报告的送审稿中他批示：“这个设计好”在1989年政治风波发生时，他意识到有人会怀疑十三大的正确性，于是先发制人，断言十三大报告“一个字都不能动”！

从十二大到十三大，我们在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上确实有许多新的突破，表现在：

第一，确认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提出党在这个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

报告指出：“在中国这样落后的东方大国中建设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新课题。我们面对的情况，既不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设想的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也不完全相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照搬书本不行，照搬外国也不行，必须从国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在实践中开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报告回顾了历史走过的路程，指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党作过有益的探索，取得过重要成就，也经历过多次曲折，付出了代价。”“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我们曾经急于求成，盲目求纯，以为单凭主观愿望，依靠群众运动，就可以使生产力急

剧提高，以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越大越公越好。”“我们还曾经长期把发展生产力的任务推到次要地位，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还‘以阶级斗争为纲’。许多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并不具有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或者只适合于某种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东西，被当作‘社会主义原则’加以固守；许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的东西，被当作‘资本主义复辟’加以反对”。

根据对国情的科学分析，十三大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这就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即通常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它与我们上面提到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形成鲜明的对照！

第二，重申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坚持生产力标准，划清科学社会主义同种种空想的界限。

返观 50 年代末以来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种种失误，说到底，是在理论上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离开生产力的发展去追求生产关系上的变革，没有把生产力落后这一根本性的制约因素放在视野之内。在党的正式文件上就曾说过“共产主义已经不是遥远将来的事情了”，它虽然鼓舞人心，却可望不可及，至于在基层组织和人民群众的豪言壮语中，就更带有令人啼笑皆非的浓重的空想色彩了。

把中国的社会主义整个地说成是“乌托邦”，未免言过其实，但是，讳言“乌托邦”，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十三大以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科学地总结历史，郑重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指出：

“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必须破除离开生产力来抽象谈论社会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观念，从根本上划清科学社会主义同种种空想